

性别、身体与空间

谢 纳

性别、身体与空间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女权主义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对空间与人的社会性做了很多的研究。她们主要致力于对不同社会类别,如性别、种族、阶级等与物质的空间的关系的研究。比如,人们是如何体验空间的?空间是否有性别属性?父权社会机制和话语是如何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对妇女的空间进行规范和限制的?”⁽¹⁾在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下,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境遇,这种压迫正是通过空间对身体的圈限而得以具体的操作实施并最终完成。因此,考察性别、身体与空间之间所充斥的权力统治的紧张关系,成为女性主义理解身体空间政治学的独特视角。

一、女性身体空间的圈限与解放

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身体的控制压迫也总是开始于空间。从身体空间中的性别政治学角度看,性别、身体与空间始终是权力统制运作的场域;“对妇女来说,现存的空间是造成她们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男性对妇女的社会空间的安排是男性控制妇女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

‘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²⁾。从此意义上说,身体控制的历史必然是空间控制压迫的历史。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性解放的倡导,打破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圈限,女性终于走出身体残缺的闺房,女性被肢解的身体空间较之传统封建帝国时期,呈现出敞开性、去蔽性的特点,特别是一部分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知识女性开始涉足一向由男性掌控的书写系统,以写作为职业,开始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历程,改写了女性生存空间边缘化的地位。在“五四”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惊喜地看到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一批女作家登上文坛,成为新女性文学的拓荒者。她们将反对身体奴役,要求个性解放的目光对准爱情、婚姻问题,《海滨故人》、《隔绝》、《旅行》、《秋风秋雨愁煞人》、《再见》等文本均从女性身体经验出发,以委婉柔韧的笔致袒露了破除生存空间圈限的女性,因无法自由恋爱,而隐匿于心的伤痛,其中冯沅君笔下那个在母爱和情爱之间备受折磨,只能以自杀求得解脱的隽华成为时代女性的代表;“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其后的60年间,尽管战事频繁、政权更迭,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以丁玲、萧红、谢冰莹、罗淑、冯铿、茹志娟、杨沫、宗璞、草明、刘真、柳溪、张洁、张抗抗、铁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与男性共执文化之牛耳,改写了文学史

上女作家边缘化的地位。

但是,纵观这70年来的女性文学创作,我们发现其文本内部不是言说着对爱情无尽的痴迷与企盼,就是宣泄着事业家庭两难中的苦闷与哀愁;不是建构着国难乡愁中“忘记自己是女人”的民族想象,就是女英雄呼喊“信仰就是我的太阳”的政治宣言,女作家并没有从身体出发思考女性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建构自觉的女性意识,其文本仍然属于菲勒斯男性中心话语系统中的启蒙话语或革命话语,女性的身体解放归化于更大的民族、国家、阶级而获得意义。如谢冰莹在《从军日记》中坦言:“恋爱是个人的私事,大家愿把生命献给国家民族的坚决信仰中,恋爱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小姐少爷们的玩意而已”。冯铿在《红的日记》中塑造的马英完全将个人的身体生命融于民族的生存中,她“眼睛里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丁玲在《苇护》、《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将社会革命伦理高悬于个体生命伦理之上,显示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自觉地将源于身体的性别意识融入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工农意识中的时代特质。

女性生存空间向男性空间的敞开,不但没有带来社会性别秩序的整体性改变,相反却进一步导致女性生存空间被男性所同质化、同一化。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丧失。在张扬“男女都一样”的“十七年”,女作家将创作视角从家庭的狭小场域拓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书写着伟大时代缔造者——“女英雄”的赞歌。女性打着“人”的旗号,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洞能指,女英雄不过是主流社会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和修辞的策略,是为了召唤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建设者行列而缔造出的一个文化符号。女性这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后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后,却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权利与可能。西蒙·波伏瓦曾说:“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因为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³⁾。女作家韦君宜在《女人》中借助描写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在女性身上的矛盾冲突及互相抑制,传达出职业女性屈从家庭角色时的无奈。即便在以社会氛围民主开放著称的新时期,以茹志鹃、谌容为代表的老作家和以张洁、张辛欣、陆星儿为代表的年轻女作家,也都关注

着女性的心灵创伤和精神苦刑,慨叹着“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言说着渴望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的启蒙话语。

中国现代文学对身体的关注从理论的层面上看,直接受益于以西苏和伊瑞格瑞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她们倡导女性通过“身体写作”这一自由的写作样态,改写其被凝视、被书写的命运。西苏提出,在父权制文化压迫下女性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她们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凭借,因而,女性只能“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女性必须写自己;“让身体被听见”(letting the body be heard)⁽⁴⁾。此外,以纪丽安·罗斯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也都用各种不同方法探究都市空间体验,“这些探究的核心处,是种对身体重新燃起的浓厚兴趣,把它看作个人和政治空间的最隐秘点,一切其他空间的一个情感小宇宙”⁽⁵⁾。上述诸多理论开启了从身体层面思考中国女性生存的先河,身体在文学的缝隙处生长起来,成为女性自我拯救的诺亚方舟。

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整个空间都是从身体开始的,不管它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国家的、全球的)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⁶⁾身体构成了我们思考女性解放,建构平等社会秩序的基础。只要女性的身体依然被男性政治权力所征用,不能真正从身体出发思考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话语都将陷入形而上学的谵妄之中。身体作为在“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的一个强大的主宰”⁽⁷⁾,存在着反抗权力的能量,因此在民族国家和阶级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我们看到权力机制总是企图策略性地控制身体,征服身体中四处乱窜的力量,并将其改造为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基地,而身体自身的价值却被消解,放逐于公众的视野之外。即便是在彰显个性自我、追逐形式革新、热衷语言试验的先锋派作家笔下,身体也始终处于缺席的地位,文学关于身体的书写一片空白。“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⁸⁾,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人的解放,社会平等与解放更无从谈起。

二、女性身体空间的敞开与放逐

在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艰难探索过程中,以林

白、陈染、徐晓斌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作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自觉地返还“女性之躯”，在女性身体经验的叙述中，重构身体空间的合法地位，改写了“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的边缘化地位。

然而，身体空间在文学中合法地位的重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安忆和铁凝自觉地抛却了以男性之眼反射女性身体的文化传统，在以身体为契机构构以女性自我为主体的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开启了文学正视女性身体的历史之门。其中，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文本，勇敢正视女性的性别，直面女性的身体，从肉身欲望的层面还原了身体对于女性的价值。身体欲望在女作家的笔下超越了精神之爱的圣洁模式，抵抗了现实生活的卑俗、龌龊，回复了人的生命空间的本体状态，由此实现了男女两性灵肉和谐的极致境地。与王安忆对身体欲望的大胆肯定张扬不同，铁凝的《棉花垛》从相反的路径入手，还原女性身体，无奈又悲凉地展示了只有身体才是女性最终的归宿，才是生存空间、生命空间的原点。《棉花垛》中，农家少女小臭子的身体被革命者所征用去勾引敌人、刺探情报，但当其反过来对革命造成威胁时，女性的身体立刻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革命者的眼中蜕变为“烂货”，于是，革命者“国”乘逮捕、提审小臭子之机，强行占有并消灭了它。作者尽管没有张扬女性的身体欲望，但其正视到身体既是男权统治的工具，也是女性最后唯一可能拥有的领地，正是在这种悖论式的追问中，深化了对女性身体命运的思考。然而，身体在文学中苏醒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多被置于“荒山”、“野岭”、“小镇”、“乡村”等边缘化社会生活场域，隐约地传达出作家对女性经验现实世界的畏惧和逃避。

与王安忆、铁凝相比，其后的林白、陈染、徐坤则更为勇敢，她们毫无顾忌地以新奇的目光发现并鉴赏女性的身体，以大胆的口吻袒露女性私密的体验、经历，以沉迷的语言颠覆了束缚男女两性的伦理等级及清规戒律，形成一种偏执的女性反抗姿态，以此改变女性被书写、被观看、被欣赏的命运，重构了女性以身体为原点的生存空间的合法性。林白、陈染等通过反抗女性的被观看、被欣赏，而重构了一个属于女性自我的身体空间，实现了对传统空间规训的反抗。在《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日午》、《致命的飞

翔》、《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等文本中，我们看到林白是何等迷恋女性的身体，她不厌其烦地借助镜子痴迷地凝视女性自己的身体，以至于其笔下的女性都美轮美奂、缥缈超凡得不食人间烟火。为此，林白解释道，“我内心总是潜伏着一股谈论女人的欲望”；“在水和水生植物中间，美丽的女人像天鹅一样浮游其中，她们美得令人心疼，在幽暗的湖畔，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她们缺乏真正的保护。在我的文字之流中，脱落的羽毛比比皆是”⁽⁹⁾。欣赏女性、赞美女性，不丑化女性，虽然使林白付出真实与深刻的双重代价，但是女性被观看、被鉴赏的命运在其笔下被彻底改变，她“将包括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并任由它自由地飞翔，尽管这种放飞自我的表达方式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又陌生”⁽¹⁰⁾，但作者正是借助这种陌生，确定了它的独特性，并以此实现了对以男性主体欲望为核心的话语方式的解构。陈染的《私人生活》更是大胆地将女性的私生活场域向公众视野敞开，从身体经验出发，“以血代墨”通过女性自己的语言，书写了女性在残缺、压抑的成长历程中所面临的心灵痛楚和精神折磨，并赋予女性书写语言以独特的隐喻功能和颠覆作用。该书的出版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私人写作”的争论。尽管论辩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得到公认，即身体作为空间/权利话语体系中最富有反抗性的力量，成功颠覆了“民族国家空间”和“阶级革命空间”的文化霸权地位，引导中国文学进入身体觉醒的时代。身体在成为文学写作乐园的同时，也印证了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列斐伏尔也曾提到，“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它拒斥那剥夺它与毁灭它的关系的再生产。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身体这个现实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折磨的东西吗？但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富于反抗性吗？”⁽¹¹⁾以林白和陈染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或“个人化写作”，依靠肉体重构家园的女作家，放飞女性的躯体，最大限度调动女性身体内蕴藏的全部征服力，抵抗男权文化的压迫。因此，“个人化写作成为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¹²⁾。其后，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长恨歌》、徐晓斌的《羽蛇》等文本莫不是以女性的视角审

视女性的身体,还原了女性清醒与迷茫、背负与绝望、逃脱与落网的身体历史。

祛除了身体压抑,摆脱了历史文化束缚的女性写作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富于变化和韵律的。然而,在20世纪末,这个以虚拟代替真实,以拟像造就现实的景观社会中,消费高居一切,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13]。因而,在以卫慧、绵绵为代表的新生代女作家笔下,文学成为过剩荷尔蒙的宣泄渠道。沉溺于快感浪潮中的女性,更是无一例外地有着“一种不能遏制无法逃避的自我放纵的冲动,一种与生俱来的暗中摇曳的疯狂”^[14]。

在新生代女作家对身体的自我展演式炫耀过程中,以女性为主体而建构的女性空间在都市消费主义的控制下,再次被颠覆、被解构,呈现出欲望中心化、消费至上化和景观展演化的特点。她们抖动着欲望的翅膀,发出蝴蝶般的尖叫,在无畏、自恋、厚颜的狂欢盛宴中,忘却了女性身体写作探求多重可能性的初衷,成为消费都市的畸形儿。都市既为女性提供了欲望的宣泄渠道,也导致欲望的极端物质化。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试图以物品堆积出荒诞的欲望场景。此外,《蝴蝶的尖叫》、《糖》、《美丽的羔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文本不但无一例外地袒露出对名牌时装强烈而执着的拜物情怀,而且其中的女性更是流连于酒吧这个消费的公共空间。在酒吧这个由绝望、破碎、虚无所构筑的另类异托邦(heterotopia)空间中,所有的阳光、信念、理想变得不堪一击,身体寻找着宣泄的出口,女性更是试图以叛逆游戏的姿态在沉沦中获得拯救,但是,黑暗中的沉沦,真的能够让女性进入澄明无蔽的生命世界吗?

身体作为空间政治学的原点,在被遗忘、被奴役千百年后,依然具有颠覆既成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力量。鲍德里亚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既然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曾连接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但是,在消费社会里,女性的身体却被赋予消费品的交换价值而成为欲望交换的手段;“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15]。“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寻找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消费社会中,女性与其身体的等同,使“肉身已不再沉重……身体轻飘起来,灵

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地栖息处”^[16]。女作家通过身体布展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寻求女性解放的尝试被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所解构,当她们与男性一同赞叹着“女性的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时,便永远放逐了女性的灵魂,由一种奴役状态转为另一种奴役状态。女性的身体写作,一方面确实强化了女性空间中身体的原点性、原初性,具有革命的颠覆性意义;另一方面,又将女性的身体再次置于被男性凝视观看的境地。因此,女性身体写作最终背离了女性空间革命的初衷,女性的身体空间再次被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所改造、同化。

改造生活,必须从改造空间开始。身体作为空间的原点既是改造的出发点,也是改造的最终目的地。因此,反对专制的压迫,必须从反对身体专制开始。只有这样才能颠覆现有社会的身体压迫规训机制,真正建构出适于人生存的差异化空间,恢复人的自由本真特性。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叙事与空间表征(11BZW099)。]

注释:

(1)(2)苏红军《时空观: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新领域》,苏红军、柏禄《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第48页。

(3)[法]西蒙·波伏瓦《女性的秘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4)[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

(5)[美]索亚《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6)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press, 1991:405.

(7)[德]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8)[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9)(10)(12)林白《林白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第295页、第295-296页。

(11)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A].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C]. Allison and Busby, 1978:896.

(13)(15)[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第150-151页。

(14)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1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经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